



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Working Paper Series** 研究報告系列

第一百零四期  
二零一零年十月

走出文學史的視野：  
朱祖謀《詞薈》的歷史語境與晚清詞學

張耀宗  
清華大學

張耀宗，男，1981年生，江蘇揚州人，現為北京清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文藝學博士研究生。

本文作者歡迎讀者提供意見。  
聯絡方法：

**電郵：[zhangyaozong07@163.com](mailto:zhangyaozong07@163.com)**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

*LEWI Working Paper Series* is an endeavour of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a consortium with 28 member universities, to foster dialogue among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East-West studies. Globalisation has multiplied and accelerated inter-cultural, inter-ethnic, and inter-religious encounters, intentionally or not. In a world where time and place are increasingly compressed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grows in density, numbers, and spread, East-West studies has gained a renewed mandate. LEWI's Working Paper Series provides a forum for the speedy and informal exchange of ideas, as scholar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attempt to grapple with issues of an inter-cultural and global nature.

*Circulation* of this series is free of charge. Comments should be addressed directly to authors. Abstracts of papers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LEWI web page at <http://www.hkbu.edu.hk/~lewi/publications.html>.

*Manuscript Submission:* Scholars in East-West studies at member universities who are interested in submitting a paper for publication should send an article manuscript, preferably in a Word file via e-mail, as well as a submission form (available online) to the Series Secretary at the address below. The preferred type is Times New Roman, not less than 11 point.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will review all submissions. The Institute reserves the right not to publish particular manuscripts submitted. Authors should hear from the Series Secretary about the review results normally within one month after submission.

*Copyright:*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copyright remains with the author. Please do not cite or circulate the paper without the author's consent.

*Editors:* Ah Chung TSOI, Director of LEWI; Emilie Yueh-yu YEH, Cinema & TV and Associate Director of LEWI.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From HKBU: CHEN Ling, Communication Studies; Martha CHEUNG,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ivienne LUK, Management; Eva MAN, Humanities; TING Wai,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ONG Man Kong, History; Terry YIP,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rom outside HKBU: Paul CROWE, David See-Chai Lam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Disclaimer:*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and its officers, representatives, and staff, expressly disclaim any and all 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 for the opinions expressed, or for any error or omission present, in any of the papers within the Working Paper Series. All opinions, errors, omissions and such are sole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uthor. Authors must conform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oncerning the use of non-published and published materials, citations, and bibliography, and ar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any such errors.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king paper series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Series Secretary:**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Kowloon Tong  
Hong Kong  
Tel: (852) 3411-7273; Fax: (852) 3411-5128  
E-mail: [lewi@hkbu.edu.hk](mailto:lewi@hkbu.edu.hk)  
Website: <http://www.hkbu.edu.hk/~lewi/institute.html>

## 走出文學史的視野：朱祖謀《詞薈》的歷史語境與晚清詞學

張耀宗

清華大學

### 摘要

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文學史成爲我們認識過去的文學世界及其理論的一個基本知識背景。文學史話語實際上隱含著對於新文化運動本身合法性的認同。朱祖謀是晚清詞學的承先啓後的關鍵人物，他的《詞薈》是對清詞的歷史的獨特回應。本文通過朱祖謀的《詞薈》來分析我們面對傳統的困境以及可能。

**關鍵字：**文學史 《詞薈》 朱祖謀 常州詞派

### 一、兩種評價

朱祖謀是晚清詞學四大家當中是比較特別的一位。他與四大家中的王鵬運、況周頤、鄭文焯關係緊密，同時民國的詞學研究大家龍榆生、夏承燾、陳匪石、劉永濟、盧前等人也都曾受教於他。可以說從 1900 年左右到 1936 年在上海逝世爲止這一段時間裡，朱祖謀一直處在晚清詞學的承先啓後的位置上。在現代學術史裡面對朱祖謀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評價。這不同評價所蘊含的意義值得我們仔細分析，因爲正是他們的評價在某種意義上規定了我們現在和朱祖謀以及整個清詞歷史接近的方式。我們必須在和他們的對話中才能重新思考看似不同的兩種評價背後所包含的一致性以及矛盾，讓我們重新認識到他們與朱祖謀之間的差異性，並且由此構成對現代學術的一些內在問題的反思和歷史批判。

### 胡適對於朱祖謀以及清詞的歷史敘述

在新文化運動之後，能夠入胡適這些新學者法眼的老輩學人不多，胡適在 1922 年就曾經說：“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是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啓超和我們幾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了，羅與葉沒用條例系統，只有王國維

最有希望。”<sup>1</sup>而在這四人之外的舊式學者，胡適當然認為他們已經是僵死的了。如果說在傳統的經史之學上，胡適還不得不注意到之前學者的成就，那麼在文學上他則不必有那樣的顧忌了。因為在白話文運動的時候，胡適已經宣告了舊文學的時代已經結束。對於晚清詞，在《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裡面胡適寫到：“這五十年的詞都中了夢窗的毒，很少有價值的。故我們不討論了。”<sup>2</sup>而在晚清對於吳文英詞提倡最有力的就是朱祖謀。這是就寫作而言，可是一旦進入新學者理解的現代學術裡，朱祖謀的詞籍考證的成績還是得到了胡適的尊敬，也就是在同一篇文章的日譯本序言裡面他又補充說：“雖然沒有很高明的作品，然而王鵬運、朱祖謀一班人提倡詞學，翻譯宋元詞集都很有功的。王氏的《四印齋所刻詞》、朱氏的《彊村所刻詞》，吳氏的《雙照樓詞》都是極寶貴的材料，從前清初詞人所渴望而不易得見的詞集現在都成通行本了。”<sup>3</sup>就連對老輩議論頗為嚴苛的錢玄同也不得不承認朱祖謀在整理詞學文獻上的功績。

朱祖謀能夠走入新學者的視野不是偶然的，這和新文化人所期待的現代學術圖景有關。胡適之所以可以將朱祖謀的創作和學術分而論之，就是因為他有了一種新的區分意識——學術、文化與政治、生活世界可以區分開來。他用客觀、科學的新學術的眼光看到了朱祖謀詞籍考證的價值，而用白話文運動的史觀看到了朱祖謀需要被排斥的部分。難道朱祖謀真的可以被這樣分而論之嗎？這種被分而論之的背後其實分享著同一種觀點，就是白話文運動與整理國故運動之間的一致性，傳統只能通過新學術得以呈現，它不再是一個活著的傳統而是被客觀分析的物件物。沈曾植最先對朱祖謀的以史例治詞的方法表示極大的欣賞，但是他同時也認識到了朱祖謀以及常州詞派推尊吳文英的價值：“周氏退薑（夔）、張（炎）而進辛（棄疾）、王（沂孫），尊夢窗（吳文英）以當義山（李商隱）、昌谷（李賀），其所據異於浙派者，豈亦置重於意內，以權衡其言外，諸諸焉有國史吟詠之志者哉！”（沈曾植《彊村校詞圖序》）朱祖謀校勘夢窗詞背後的動力恰恰來自於他本身對於夢窗詞的深刻體會。在他們的世界裡面，寫作的意義無疑對於詞籍校勘具有優先性，但是

<sup>1</sup>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第三冊，臺灣聯經出版公司 2005 年版，第 734 頁。

<sup>2</sup> 胡適《胡適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9 頁。

<sup>3</sup> 胡適《胡適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8 頁。

這種關係在現代學術視野裡面被理所當然地分離開來，而且它們之間的位置關係也被同時倒置了。

### 龍榆生對於胡適的修正

對於胡適站在白話文學史觀的立場否定晚清詞以至整個清詞歷史的看法，自從白話文運動以來這種觀點就一直受到新文化運動各種批評者的挑戰。作為朱祖謀的弟子，龍榆生對胡適的《詞選》早就深感不滿，對被胡適一筆帶過的晚清詞史特別是以王鵬運和朱祖謀為代表的晚清四大家的成就大力表彰。他對朱祖謀的看法和胡適幾乎是針鋒相對：“先生自稱四十後，始從事倚聲之學。于儕輩中學詞最晚，而造詣乃最深。……先生亦自言，於夢窗之闡奧，自信能深入。……止庵所謂奇思壯采，騰天潛淵，為夢窗真實本領，殆亦先生所從證入，彼貌為七寶樓臺，炫人眼目者，烏足於此耶？”<sup>4</sup>朱祖謀被強調的已經不僅僅是他的詞籍考證的學術意義，而是他在整個文學史中的意義和位置。龍榆生在這裡似乎超越了白話文運動的文學史觀，能夠客觀地描述出文學歷史本身的多樣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龍榆生對於朱祖謀的看法裡面包含著一個內在的矛盾。龍榆生說：“自常州詞派崇比興以尊詞體，而佻巧浮滑之風息。同治、光緒以來，國家多故，內憂外患，更迭相乘。士大夫憂于國勢之危，相率以幽隱之詞，籍抒忠憤。其篤學之士，又移其校勘經籍之力，以從事於詞籍之整理與校勘，以是數十年間，詞風特盛，非特為清詞之光榮結局，亦數千年來詞學之總結束時期也。”<sup>5</sup>他雖然大力表彰清詞中興以及常州詞派的重要性，但是仍然在一個時間性的序列裡面來描述它們的歷史，這和胡適是一致的。必須唯一的區別僅在於胡適將清詞的歷史整體否定了，而龍榆生認為在宋詞之後還存在著清詞的中興，並且在晚清達到它的高峰。當朱祖謀的寫作在這樣的一個文學史背景裡面呈現出來的時候，不可避免地被龍榆生既當作一個鮮活的經驗的同時也被他當作一個客觀的物件被歷史化了，也就是說寫作本身成為了文學史的研究物件。

<sup>4</sup>龍榆生《晚近詞風之轉變》，《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第 381 頁。

<sup>5</sup>龍榆生《中國韻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4 頁。

當龍榆生作為一位寫作者時，他的寫作必須和他的前輩朱祖謀等人形成某種關係——或者競爭或者模仿——也就是說他必須把自己放置於一個非客觀的物件化了的歷史譜系裡面才有意義。在這個歷史譜系裡面，上啓溫庭筠、韋莊，下至晚清四大家，他們都不再是一個文學史的物件，而是可以追慕和競爭的活的物件，這些作家的風格打破了時間的序列而隨時可以從自己的時代走來現代的追慕者或者競爭者的身邊。所以龍榆生提倡蘇辛詞能夠鮮明地接續前輩，宣導新的創作風尚，也非常鮮明地表明瞭自己的立場，毫不隱藏自己宣導蘇辛詞的時代用意。即便如此，他還是深受一種追求客觀的現代性話語的影響，在表達他的寫作理想的時候認為：“今欲就常州未流之弊，允宜折中浙、常兩派及晚近譚、朱諸家之說，小令並崇溫、韋，輔以二主、正中、二晏、永叔；長調則於北宋取耆卿、少遊、東坡、清真、方回，南宋取稼軒、白石、夢窗、碧山、玉田。”<sup>6</sup>對於稍有寫作經驗的人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夢一般的理想。馮煦就說：“詞家各有途徑，正不必強事牽合。”他當時所針對的是毛子晉評價《芸窗集》時候的不妥：“子晉乃取其警句，分配放翁、邦卿、秦七、黃九；以一人之筆，兼此四家，恐亦勢之所不能也。”對所謂價值中立的現代學術立場的尋求還體現在龍榆生對朱祖謀的《宋詞三百首》的評價上。他認為晚清詞學“其源出常州，而門庭之廣、成就之大，則遠非張、週二氏所能及矣”，朱祖謀的《宋詞三百首》和周濟的《宋四家詞選》相比，其勝處正是在於它的“不偏不倚”——“對止庵退蘇進辛之說，稍致不滿，且以碧山與于四家領袖之列，亦覺輕重不倫，乃益致力於東坡，輔以方回（賀鑄）、白石（薑夔），別選宋詞三百首”<sup>7</sup>。

龍榆生不斷地將朱祖謀以及晚清詞學的進步落實在比張惠言、周濟的詞學觀點更具包容性這個意義上。或許在龍榆生自己的內心世界裡面，朱祖謀的寫作仍然是鮮活的東西，不然他就不會一再強調朱祖謀與吳文英之間的聯繫，強調常州詞派的重要性。但是他無法找到一個能夠真正和胡適相對峙的立場以及描述這個立場的話語來表達。所以他必然地只能去通過文學史這個由白話文運動自己所提供的學術立場去拯救被這個運動本身所壓抑的晚清詞學。也就是說他除了在一個文學史的話語

<sup>6</sup> 龍榆生《論常州詞派》，《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第 405 頁。

<sup>7</sup> 龍榆生《晚近詞風之轉變》，《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第 382 頁。

框架裡面來講述朱祖謀在現代學術裡面的合法性別無其他方法。龍榆生對胡適的修正——重新確認朱祖謀在文學史上意義，僅僅是整理國故運動後“文言”與“白話”之爭由政治性的討論轉入學術話題的必然邏輯。政治性的討論強調的是行動、斷裂以及選擇，而學術的客觀分析顯然抹去了前者的激進色彩。這也是白話文運動通過整理國故這樣以退為進的方式將自己合理化的一種方式。這樣對於朱祖謀的詞學與寫作的內在敘述必然讓位於將他放置在一系列外在性的關係裡面描述，從而獲得其重返歷史的可能，同時也將朱祖謀的詞學變得抽象化和知識化了。

以胡適和龍榆生為代表的兩種對朱祖謀的不同評說極大地影響了後人對於朱祖謀的看法。可是，只要我們能夠自覺到我們對於傳統的認識、取捨以及敘述都深受國粹運動以及整理國故運動的影響，就會明白，如果不能構成對於它們所形成的一系列或隱或現的知識話語的內在批判，同時將我們自身知識予以“問題化”，那麼每一次看似更為完整的客觀的描述就有可能僅僅成為一次知識和資料的擴張，就不可能真正地將傳統變成鮮活的物件。文學史壓抑了寫作與批評之間的複雜聯繫，它將這種關係予以了物件化，即使如龍榆生這樣不斷地以寫作詞為己任的現代學者也失去了寫作本身所具有的批評氛圍。而他用文學史的方式來重新理解前輩的同時實際上也決定了他理解自己作品的方式和可能性。如果說以前我們對於朱祖謀的探討是一個我們去賦予這個研究對象以意義的過程，那麼現在應該反過來，讓他來構成對於我們的提問。下面就以朱祖謀的《詞薈》為中心來分別從兩個方面來回應我們上述所提出的問題。一個方面，朱祖謀如何通過編選這樣一部清詞選來建立自我與他的歷史之間的關係，在這裡我們將重新理解他與他所承接的常州詞派之間的關係。另一個方面，我們將從《詞薈》裡面對於小令的重視來看寫作與批評之間的磨合。常州詞派不是一個簡單的固定的文學史概念，它總是在一個不斷形成的過程之中的。

## 二、《詞薈》與常州詞派

朱祖謀的《詞薈》是他在辛亥革命以後客居蘇州時編選的一份清詞選本，也是譚獻《篋中詞》之後最為重要的一個清詞選本。從毛奇齡一直到況周頤，一共選了十五位詞家。它展現出了晚清非常出色的一位詞家對於自己的朝代的創作成就的思

考。除了張惠言的詞選了四首，曹貞吉的詞選了六首之外，其他的作家都比較均衡，一般都是十首上下。如果按照一般的文學史的眼光來看的話，這本選本從選詞的數量差距上並不能看出朱祖謀的偏向。而從詞作者的選擇上看，也看不出特別的宗派意識。那麼，能不能簡單地像龍榆生所說朱祖謀在詞學觀點上和常州詞派相比有了進步和拓展，還是說朱祖謀在常州詞派的內部提出了新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常州詞派內部對於《詞薈》中涉及到的一些作家作品的分歧來重新理解朱祖謀以及常州詞派。

### 《詞薈》的常州詞派理論語境

譚獻認為清代的詞派只有到了陳維崧和朱彝尊才開始有大的氣象，所謂“錫鬯、其年出，而本朝詞派始成”。朱彝尊的一段夫子自道就頗能說明浙派在創作上的風尚：“念倚聲雖小道，當其爲之，必崇爾雅，斥淫哇，極其能事，則亦足以宣昭六義，鼓吹德音。往者明三百禩，詞學失傳，先生（曹溶）搜輯遺集，余曾表而出之。數十年來，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春容大雅，風氣之變，實由於此。”從這段話中也可見出，朱彝尊所說的“宣昭六義，鼓吹德音”是以姜夔和張炎作爲典範的。浙派僅僅讀懂了姜、張兩家詞的清空醇雅的一面，從創作上看，作爲浙西詞派的流弊之一的詞作的意旨枯寂和這有密切關係。正如譚獻所批評的：“浙派爲人詬病，由其以姜、張爲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澀、玉田之潤”，所以張惠言以《詞選》爲發端，開創常州詞派。常州詞派不僅僅在創作上提倡新的寫作風氣而且提出了新的看待詞的眼光，認爲詞應該具備意內言外之旨，提倡比興。常州詞派是通過一種寫作的提倡和對於宋代詞史的重新闡釋來達成對於詞體的理論建構。以至於後來經常有人將常州詞派僅僅看成創作的一個流派而已，或者僅僅注意到它尊體的策略而忽略了它是在傳統語境裡面關於詞的理論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建構。

浙派代表人物朱彝尊的詞朱祖謀一共選擇了十首。在常州詞派興起之前朱彝尊的《靜志居琴趣》和《茶煙閣體物集》兩本詞集受到非常多的推崇。浙西詞派的另一位大家厲鶚對《靜志居琴趣》非常讚賞：“寂寞湖山爾許時，近來傳唱六家詞。偶然燕語無人語，心折小長蘆釣師。”謝章铤則說：“今之學金風亭長者，置《靜

志居琴趣》、《江湖載酒集》於不講，而心摹手追，獨在《茶煙閣體物》卷中”。但是在常州詞派理論興起之後，一方面，作為浙派宗師，朱彝尊的詞當然受到了批評，另一方面，對於他的詞的評價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朱彝尊《江湖載酒集》中懷古寄予個人際遇的詞受到強調，而《靜志居琴趣》和《茶煙閣體物集》則受到壓抑。況周頤在《詞學講義》裡面說：“《江湖載酒》一集，雖距宋賢堂奧稍遠，而氣體尚近沉著。”<sup>8</sup>朱祖謀說朱彝尊的詞是“體素微妨耽綺語”，譚獻說朱彝尊的詞“情深”但是傷於碎。也正因為有了對於朱彝尊詞的共同的理解，朱祖謀和譚獻在選擇朱彝尊的詞作的時候，不僅僅多數的選目是一樣的，而且所選相同的詞作都是來自于朱彝尊的《江湖載酒集》。

作為一種新寫作的宣導，常州詞派和浙西詞派之間的關係是斷裂的。不過，它作為一種創作流派的同時，常州詞派隨即提出了對於詞這一文體的新的理解。正是站在後者的角度，朱祖謀可以來重新認識自己之前的從順康一直到晚清的詞作。作為寫作者他們之間具有競爭的關係，但是常州詞派對於詞體的認識可以使得他們將自己寫作上的競爭者再納入到自己的對於詞體的新理解當中。對於朱彝尊的選擇並沒有像有些人所認為的是體現了朱祖謀照顧到清詞歷史本身的不同風格，提供了一個吸納不同流派的立場。恰恰在選朱彝尊哪些詞上面，朱祖謀是有一個基本的價值立場的，就是對於常州詞派的比興寄託說的認同。然而朱祖謀和譚獻對朱彝尊的《靜志居琴趣》和《茶煙閣體物集》也並沒完全否定。他的《南樓令》（疏雨過輕塵）、《暗香》（紅豆）等詞還是受到了肯定，被選入《詞薈》。朱祖謀一方面凸顯了朱彝尊那些懷古詞的地位，另一方面對他的情詞也有認同。在《詞薈》裡面選了朱彝尊的情詞之後還對它進行批評，這豈不是矛盾。或者這可以被解釋成常州詞派比興寄託說本身的狹隘性造成了對某一類風格詞的無視或者可以被解釋成朱祖謀在《詞薈》裡面開始具有了一種客觀的看待文學史不同風格的眼光。

在現代學術史上並非沒有人對常州詞派比興寄託說帶來的困境有所解釋，龍榆生認為朱祖謀接受了常州詞派而又不為常州詞派觀點所囿，而沈祖棻則認為：“比興只是歷史悠久的和經常被使用的藝術表現方法之一，而決不是惟一的方法；沉

<sup>8</sup>屈興國《蕙風詞話輯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01 頁。

鬱也只是美好的風格之一，而決不是惟一的美好風格。……在詞史上，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傑作是用賦體寫的，它們的風格也是多種多樣的。在這種大量存在的事實面前，陳廷焯等的看法就無法掩蓋其片面性。”<sup>9</sup>兩者的立論角度雖然不太一樣，但是都希望肯定常州詞派的比興寄託說的部分合理性的同時再對它的不足之處提出批評。實際上，這兩種觀點也代表了現代學術史上評價常州詞派的典型立場。這是用一個客觀的外在立場來解釋常州詞派自己內部的問題，忽略了常州詞派理論的豐富性。把常州詞派僅僅理解成封閉的比興寄託這樣一個單獨的理論觀念。實際上比興寄託是在常州詞派的理論譜系裡面是在一系列的關係裡面被強調的，常州詞派並沒有提出一個僵硬的體系，而是將比興寄託說非常靈活地運用。無論是周濟對於張惠言的批評，還是後來的譚獻、端木采、馮煦、陳廷焯、晚清四大家等人和張惠言、周濟的對話、修正，都使得常州詞派對於詞這一文體的認識越來越豐富，常州詞派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形成的。隨著晚清王鵬運、朱祖謀等人對於兩宋詞籍的重新校勘使得許多兩宋詞人作品的全貌得以重現，同時帶來了不同作家如何闡釋的問題，像馮煦、鄭文焯、陳銳提升柳永，朱祖謀提升蘇東坡等都必然要對張惠言、周濟的觀點提出不同見解。除此以外，還有如何在比興寄託之中去理解像沈祖棻所提到的用賦體寫的詞以及在常州詞派的內部將“情”也就是情感作為一個有效地批評觀念等問題。這些情況都迫使常州詞派的後繼者們做出新的反應。

和常州詞派的比興寄託說一起出現的還有一個重要概念就是正變論。正變論是和比興一樣是貫穿整個傳統詩學的一個關鍵字。<sup>10</sup>但是正變論在這裡不僅僅具有與以往作為儒家詩學運用的同一性，而且它被重新運用於詞的編選之中，是與對於詞的特點重新認識和界定，並且與編選者的寫作是緊密相連的。因為寫作者自己的寫作也必須放置於這樣一個正變的關聯中來獲得意義。在《詞筌》裡面無論是對於不同的作者的編選還是在一個作家的不同風格作品的選擇上，其表面的多樣性的背後所具有的統一性正在於常州詞派對於詞體的新的認識。不同的風格是在正變的框架裡面來處理的，而不是一個外在的客觀的歷史眼光。正變之所以具有意義，這在於

<sup>9</sup> 沈祖棻《清代詞論家的比興說》，《宋詞賞析》，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308-309 頁。

<sup>10</sup> 相關論述可以參見朱自清《詩言志辨》，《朱自清全集》（卷六），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第二版。

編選者自己首先是一位詞的寫作者。變的部分不代表不好，而是作為一個寫作者來說，正變這樣的區分不僅關係到自己寫作與其他作者的競爭，自我與某一種寫作傳統之間的關係。還關係到對於寫作上的典範，也就是說究竟是哪些人代表了一首好詞的可能性。這還體現在他們的作品集的編訂上。例如朱祖謀自己的詞，王鵬運認為在庚子之後的詞要比之前的好，所以建議他把後來的詞編成正集，其他的編為別集。王鵬運的建議得到了朱祖謀的認同，這種編法打破了時間的編年的序列，恰好反應出的是他們背後的對於詞作的正變的認真。

另外晚清常州詞派的繼承者當中的況周頤和陳廷焯對於朱彝尊的豔詞也保持了意味深長的複雜態度。他們和朱祖謀、譚獻的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非常直接地對朱彝尊的豔詞表示讚賞而朱祖謀雖然選了朱彝尊的情詞但是顯然對他並沒有理論上的認同。我們清楚，陳廷焯在寫作《白雨齋詞話》之前編有《雲韶集》，在他遇到莊棫之後摒棄了自己年輕時候的詞學觀點完全認同常州詞派的比興寄託說，但是在《白雨齋詞話》裡面他居然對朱彝尊的《靜志居琴趣》大加贊許，說他的這本詞集“味厚”，甚至用八則詞話的篇幅來讚揚朱彝尊的《洞仙歌》十七首。他為自己這樣讚賞朱彝尊的豔詞這樣聲辯：“吾於竹垞獨取其豔體，蓋論詞于兩宋之後，不容過刻，截取可也。”<sup>11</sup>就在同一本詞話裡面，他又說朱彝尊的詞“顯悖乎《風》《騷》”，這時候又是批評的態度了，這是《白雨齋詞話》裡面的一個裂痕，後來陳鐵峰將陳廷焯對《靜志居琴趣》的評論悉數刪去。《白雨齋詞話》的內部問題其實是帶給我們一個重新審視常州詞派的機會，而文本內部的看似矛盾的東西也不是刪改就可以抹殺的。除此之外，況周頤在《蕙風詞話》裡面說：“或問國朝詞人，當以誰氏為冠？再三審度，舉金風亭長對。問佳構奚若？舉《搗練子》云云。”<sup>12</sup>

將朱彝尊推舉為清代最好的詞人，況周頤的話在晚清的常州詞派的語境裡是非常令人驚訝的，因為在王鵬運、朱祖謀等人看來清詞最能夠超邁宋人的地方就是將家國歷史的寄託感慨寫進詞中。即便譚獻在《篋中集》裡面對《桂殿秋》（思往事）表示讚賞，也僅僅是說：“單調小令，近世名家，複振五代、北宋之緒。”朱祖謀也寫豔詞，這在況周頤似乎有點興奮，他說朱祖謀的《南鄉子》六首，“語豔

<sup>11</sup>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2 頁。

<sup>12</sup> 屈興國《蕙風詞話輯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40 頁。

而味厚，得《花間》之遺。雖兩宋名家，鮮能辨此。”還有後來和新文化人在文學觀點上展開激烈爭鋒的胡先驌也對這一部分被朱祖謀放入別集部分的詞表示讚賞，認為這些豔詞可以直追《花間》。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詞學風氣的變化的細微消息。<sup>13</sup>

### 對於蔣春霖詞評價的分歧

再讓我們來看朱祖謀所選的另一位詞家蔣春霖。朱祖謀總共選了他的十首詞作。朱祖謀在手批《篋中集》中說：“水雲詞，盡人能誦其雋快之句，嘉、道間名家，可稱巨擘，宜複翁仰倒賞擊，而有會于冰叔之言也。顧其氣格駁而不純，比之蓮生差近之，正唯其才僅足為詞耳。”<sup>14</sup>“盡人能誦其雋快之句”，對此陳廷焯很有心得，他在《白雨齋詞話》裡面大量徵引了蔣鹿潭的詞作裡面的“雋快之句”<sup>15</sup>。吳梅在中山大學的講義《詞學通論》很多的觀點都是來源於《白雨齋詞話》，但是吳梅也不是沒有自己的理解。他對蔣鹿潭的看法就對譚獻和陳廷焯的觀點進行修正。吳梅認為譚獻將蔣鹿潭與項廷紀、納蘭容若並置很不妥當，納蘭容若和項廷紀的詞都是以聰明取勝而已，可是蔣鹿潭“盡掃葛藤，不傍門戶，獨以風雅為宗，蓋托體更較皋文、保緒高雅矣”，在具體的寫作上更是獨步，“鹿潭不專尚比興，《木蘭花》、《台城路》，固全是賦事；即一二小詞，如《浪淘沙》、《虞美人》，亦直本事，絕不寄意韓闥，是真實力量，他人極力為之，不能工也。”<sup>16</sup>這樣看來，雖然吳梅、陳廷焯、譚獻、朱祖謀四人都認為蔣鹿潭的詞作獨步一時，但是在具體的意見上特別是圍繞著譚獻在《篋中詞》裡面對於蔣春霖的評說，吳梅和朱祖謀都有自己不同的意見。例如，朱祖謀、陳廷焯對蔣鹿潭的詞在讚賞的同時也有各自的不滿，比如“氣格駁而不純”、“尚未升風騷之堂”。吳梅的意見則認為蔣詞托體高雅、詞宗風雅，譚獻不應該將納蘭以及項廷紀和蔣詞相提並論。譚獻有兩則詞話，一則是他在評點周濟《詞辯》所選的東坡詞《蔔運算元·雁》時所提出的“作者之意”與“讀者之意”；另一則就是在《篋中詞》裡評蔣春霖時提出的

<sup>13</sup> 胡先驌《評朱古微彊村樂府》，《學衡》第10期（1922年）。

<sup>14</sup> 嚴迪昌《近現代詞紀事會評》，黃山書社1995年版，第177頁。

<sup>15</sup>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121頁。

<sup>16</sup> 吳梅《詞學通論》，《吳梅全集理論卷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29頁。

“學人之詞”、“才人之詞”、“詞人之詞”的劃分。這兩則詞話被後來的論詞者不斷單列出來在寫作與天才、作者與讀者等新的現代性話語裡面進行不同闡發而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

這裡先暫且分析朱祖謀的觀點。朱祖謀雖然和譚獻都贊成蔣春霖的詞寫得好，但是他似乎並不贊成譚獻的“詞人之詞”的提法，——“比之蓮生差近之，正唯其才僅足為詞耳”。下面我們還會提到，在晚清的詞學理論的語境裡面，那些“詞人之詞”以及小令受到越來越多的注意，對於詞家的性情和才氣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強調。在《詞筍》裡面朱祖謀將蔣詞放在非常高的位置，認同他的詞史特徵以及才情，在寫作上能夠別開生面。蔣春霖身處亂世，詞作具有杜甫的詩史特點而依憑自己的才氣出之。朱祖謀對於蔣春霖的態度不是簡單地否定也沒有簡單地肯定，而是將他放置在一個關係裡面提出來。對蔣春霖詞的認同無論是從“詞人之詞”的才氣性靈還是從“詞史”的角度都只能夠見其一面，如果說這些是“意內”的話那麼什麼是它的“言外”呢？朱祖謀因此提出了氣格的問題，“駁”是因為才氣橫溢，而怎麼才能夠“純”，也就是渾厚，只能靠所謂“潛氣內轉”。顯然在這裡，朱祖謀對於蔣春霖詞的渾厚還有不滿足的地方，陳廷焯將他比作張炎是有其道理的。在常州詞派看來，一首詞應該既要有才豔思力，也能夠歸於蘊藉深厚，而將這兩者結合最好的只有周邦彥，所謂“集大成者也”。有人認為像納蘭性德、蔣春霖、項廷紀等人的詞是與性情、才氣相關，超越了浙派以及常州詞派的框架。這種說法從單純的寫作上將常州詞派理解成以周、辛、王、吳四家作為典範詞人的寫作流派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單獨的性情或者能夠以詞寫史就可以成為獨立的批評概念，常州詞派顯然沒有否認這些概念的重要性但是它們必須是放置在一系列的關係裡面被討論，只有這樣寫作才有家法也才有其自身的意義，整個詞史也才能夠在互相的競爭和比對中書寫內在的連續性。

儘管《詞筍》裡面十五位詞家都別開生面各有所長，但是他們在常州詞派的詞學理論裡面仍然可以被放回到一個大的詞史也就是和唐宋詞家的關係裡面去批評和討論。從張惠言開始通過提倡意內言外、比興寄託的方式重構了唐宋詞史的內部結構，這既構成了對當時浙派末流詞作的批評宣導了新的寫作風氣，更重要的是同時它形成了一種以比興寄託說為根本的理論。以前的詞派在建構自己的理論的時候雖

然也提及風雅也提出自己追摹的唐宋作家，例如雲間派倡《花間集》，浙派倡姜夔、張炎，但是這些都是斷裂性的或者說排他性的，詞史的內在的連續性是由一種寫作否定另一種寫作而形成的，是不同派別之間的鬥爭史，但是在常州詞派的理論框架裡面詞的歷史第一次獲得了其內在的意義的連續性，它宣導正變、比興之說是有其深刻的內涵的。如果將清代的詞史除了幾家“詞人之詞”之外的詞學大家看作成唐宋詞史不同形式的複製和模仿，那麼這個問題的提出本身就已經外在于一個傳統的寫作譜系之外，因為它將模仿與追摹預設成爲一種完全沒有創造性的行爲，同時也將一個意義的關聯體的批評方式預設成爲消極的壓制關係。

所以從表面上看《詞薈》表現了清代詞史自己獨特的成就和自己的面目，是清代詞史的一部精選之作但是實際上它包含著複雜的對話，既與唐宋詞人對話也與作爲編者的朱祖謀自己的詞學語境對話，對於朱祖謀來說，只有意義的關聯才是最重要的，而非有意地去寫一部清代的詞史，這種渴望是他世界之外的東西，是現代學術的產物。也只有像這樣蘊藉了豐富的意義關聯的詞選才有意義，而我們對此已經感到一定程度的陌生，已經開始將豐富的意義的歷史同質化，去追求一個客觀科學的歷史，這本身意味著我們已經預先承認了用文言寫作的歷史的確已經終結，同時認同了白話文運動的絕對合法性，而對清詞究竟是如何被終結的以及這個終結過程中的話語權力的爭奪表現出了漠然。

### 三、小令的意義與毛奇齡的再發現

#### 常州詞派對於令詞的觀點

就詞的體式而言，朱祖謀在《詞薈》裡面選了將近六十首的小令，佔據了所有選目的差不多一半的篇幅。這有什麼特別之處呢？這就需要我們回顧一下常州詞派理論中對於令詞的一些看法。我們知道常州詞派理論中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將唐五代詞幾乎是作爲詞的最高境界來看待的，對於它們的獨特闡釋奠定了整個常州詞派比興寄託說的基礎。鄭文焯以溫庭筠的《楊柳枝》八首爲例發揮出他對於唐五代詞的看法：“唐人以餘力爲詞，而骨氣奇高，文藻溫麗。有宋一代學人，傳志於此，

駸駸入古，畢竟不能脫唐五代之窠臼，其道亦難矣！”<sup>17</sup>而王鵬運對於《花間集》的看法更加如此，況周頤就記錄了王鵬運對於歐陽炯《浣溪沙》：“蘭麝細香聞喘息。綺羅纖縷見肌膚。此時還恨薄情無？”的闡釋：自有豔詞以來，殆莫豔於此矣。半塘僧驚曰：“奚翅豔而已？直是大且重。”況周頤感歎道：“苟無《花間》詞筆，孰敢為斯語者？”<sup>18</sup>周濟則說：“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若乃離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沈互拾，便思高揖溫、韋，不亦恥乎？”<sup>19</sup>他們的看法可以一直追溯到張惠言對於溫庭筠的推崇：“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張惠言的觀點受到了許多挑戰也有人從中作為調人將張惠言的理解當做是他尊體的策略。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張惠言對於溫庭筠的解釋並非針對溫庭筠一人這麼簡單，而是由他開始實現了對整個唐五代以及宋代詞史的重寫。也因此，在常州詞派的詞學理論裡面詞的發展不再是從唐五代到北宋再到南宋這樣一個時間的發展序列，更非豪放與婉約的劃分，而是所有的詞人都處於一個意義的關聯上。龍榆生就認為：“尊體之言，亦已成過去，一時有一時之風尚，一家有一家之特質，不牽人以就我，不是古以非今”<sup>20</sup>。

除了溫庭筠之外，唐五代詞作家裡面深受推崇的還有李煜以及馮延巳，例如，馮煦說馮延巳“俯仰身世，所懷萬端，謬悠其詞，若顯若晦，揆之六義，比興為多……世以靡曼目之，誣已。”<sup>21</sup>而王鵬運則認為李煜是：“超逸絕倫，虛靈在骨……後起之秀，格調氣韻之間，或月日至，得十一於千百。若小晏，若徽廟，其殆庶幾。”<sup>22</sup>這裡需要強調的是，常州詞派理論對於唐五代詞的推崇最主要的用意是從意內言外之旨出發來構建詞的比興寄託的本質，對於詞的體式並沒有特別地關注。所以，唐五代詞雖然都是令體但是常州詞派並沒有將其獨立出來論述，而是其

<sup>17</sup> 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臺灣裡仁書局 2007 年版，第 30 頁。

<sup>18</sup> 屈興國《蕙風詞話輯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6 頁。

<sup>19</sup> 黃蘇、周濟等《清人選評詞集三種》，尹志騰校點，齊魯書社 1988 年版，第 192 頁。

<sup>20</sup> 龍榆生《選詞標準論》，《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第 85 頁。

<sup>21</sup> 馮煦《陽春集序》，施鵬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 頁。

<sup>22</sup> 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臺灣裡仁書局 2007 年版，第 113 頁。

題中應有之義。倒是另一位和常州詞派論詞宗旨相距不遠的周之琦對於小令有直接地關注。他所選的《心日齋十六家詞選》被譚獻推為“截斷眾流，金鍼度與，雖未及皋文、保緒之陳義甚高，要亦倚聲家疏鑿手。”<sup>23</sup>譚獻曾經拿自己的《複堂詞錄》與周之琦的《十六家詞選》相比，他發現最大的不同之處也正在于周之琦多收小令——“與周止齋《四家詞選》同者十九，與周稚圭同者十五而已，以稚圭喜收疏爽小令也”。<sup>24</sup>周之琦認為令詞的最高境界就是唐五代詞，他覺得宋代詞人多工慢詞，即使寫令詞“仍與慢詞聲響無異”，“宋詞閒雅有餘，跌宕不足。長調有清新綿邈之音，小令則少抑揚抗墜之致”<sup>25</sup>，也因此對於納蘭容若的令詞周之琦儘管很讚賞“格高韻遠，極纏綿婉約之致，能使殘唐墜緒絕而複續”，但是他仍然不能和五代的李煜相比，“第其品格，殆叔原、方回之亞乎”。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見出，常州詞派如張惠言、周濟、譚獻等人所宣導的學習對象是周邦彥、王沂孫、辛棄疾、吳文英等這些以慢詞擅長的作家。這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常州詞派對於詞的認識——“其文小，其聲哀”，所以特別容易辭意浮露，風格靡麗而喪失意內言外之旨。而小令無疑最易墮入這些末流之中。小令雖然在清代一直有人在寫但是專門的大家並不多見，刻意經營小令的人在常州詞派之後更是很少，但是這一情況在晚清的時候慢慢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況周頤自己是非常反對別人學習唐五代詞的，他說：“《花間》高絕，即或詞學甚深，頗能窺兩宋堂奧，對於《花間》尤為望塵卻步耶”<sup>26</sup>，而像李重光之性靈、韋端己之風度、馮正中之堂廡如果沒有天分和性情更是不容易學到。但是他自己和王鵬運、張祥齡三人的《和珠玉詞》就是刻意小令之作。還有馮煦不僅為《陽春集》、《和珠玉詞》、《唐五代詞選》作序而且其寫作的小令還深得譚獻的讚賞——“單調小令，上不侵詩，下不墮曲，高情遠韻，少許勝多。殘唐北宋，後成罕格。夢華有意於此，深入容若、竹垞之室，此不易到”<sup>27</sup>。在王鵬運、朱祖謀等人合作的《庚子秋詞》裡面也幾乎是小令：“秋夜漸長，哀蛩四泣，深巷犬聲如豹，獐惡戒人，商

<sup>23</sup> 譚獻《清詞一千首》（《篋中詞》），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2 頁。

<sup>24</sup> 譚獻《複堂日記》，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01 頁。

<sup>25</sup> 杜文瀾《憩園詞話》，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第三冊，中華書局 2005 年版，第 2865 頁。

<sup>26</sup> 屈興國《蕙風詞話輯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3 頁。

<sup>27</sup> 譚獻《複堂日記》，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9 頁。

音怒號，砭心刺骨，淚涔涔下矣。乃約夕拈一、二調以爲程課，選調以六十字爲限……”<sup>28</sup>我們發現清末重要詞家都對令詞有過認真的寫作，說唐五代小令不易學但是沒有說北宋之後如二晏這些小令大家不可學。小令在晚清的常州詞派內部逐漸受到重視不能簡單地理解成——有清以來一直不斷地有人在用令詞這麼一種詞的體式寫作，而他們的寫作只是延續了這樣一種狀況而已。寫作是最具有政治性的行爲，它往往提出新的理論問題。小令在常州詞派裡面某種意義上是受到自我壓制的一種文體。雖然會有人寫但是在常州詞派內部很少有作家說自己很擅長小令的寫作，雖然也寫一些清豔的令詞但自己都清楚是遊戲筆墨而不在意。他們心目中經典的作家以及他們需要追摹的物件仍然是吳文英、周邦彥、王沂孫、等這些以慢詞著名的作家。例如王鵬運就勸況周頤不要印刻《玉梅後詞》，但是況周頤卻認爲符合重、拙、大之旨。朱祖謀在《詞薈》裡面選擇了大量的的小令，像況周頤的詞作一共選了九首而小令就占了五首。

我們知道《詞薈》不是一本泛選的詞選，沒有必要像《篋中集》一樣照顧全面廣泛收羅詞作，即使龍榆生在朱祖謀去世前向他提出刊出這本詞選的時候，朱祖謀仍然認爲還需要刪改，可見他的用心之一斑。他的選擇代表他認爲有清一代的小令之作有自家的面目。我要特別強調的是，無論是王鵬運、馮煦、況周頤還是朱祖謀都是在常州詞派內部提出問題的，他們從來沒有因此動搖過對於《花間集》的常州詞派的傳統看法，在這個立場上開始出現動搖的人是況周頤。我們知道，況周頤在1905年《大陸報》上發表的《香海棠館詞話》中提出了“重、拙、大”的觀點。他也重新解釋了寄託的概念，他說：“即性靈，即寄託……夫詞如唐之《金荃》，宋之《珠玉》，何嘗有寄託，何嘗不卓絕不古，何庸爲是非之寄託耶。”他雖然還在認同常州詞派的一些基本概念，但是他通過性靈而將常州詞派理論裡面複雜的關係給予大大地簡化了。他的詞作以及詞學主張除了朱祖謀的褒獎之外，實際上在晚清受到了諸多批評。怎麼來理解在他的語境裡面所受到的批評？有關這一點我將另文論述。

<sup>28</sup>王鵬運、朱祖謀等《庚子秋詞》，臺灣學生書局1972年版，第3頁。

## 毛奇齡詞的再發現

小令的寫作沒有造成常州詞派內部的斷裂但是提出了新的理論問題。在已有的常州詞派內部如何形成一套新的理論話語來建構這種寫作的意義或者說如何將這個新的問題吸納進常州詞派的詞學理論中？所選的令詞裡面最為引人關注的是毛奇齡。

毛奇齡和陳維崧都曾經受到過雲間鉅子陳子龍的影響，但是毛奇齡的詞在當時很少有人把他放在一個突出地位置，在常州詞派內部像譚獻以及陳廷焯都對他不太重視，《篋中詞》裡面只選了他四首詞，朱祖謀的選目和這四首全不相同，可以說是朱祖謀最先給予毛奇齡的詞最高認同，將他放在清代詞人之首選了他十一首令詞。在一份還不很確定是朱祖謀原稿的《清代詞壇點將錄》裡面毛奇齡是和王鵬運、朱祖謀以及蔣春霖並列一起的，名列“馬軍五虎將”<sup>29</sup>。從選目上看朱祖謀最為看重的是毛奇齡的單調小令，例如《摘得新》：“河沒時。霜繁月已低。錯驚銀榻曙，起來遲。扶上鬢梢隨意縮，亂絲絲。”《江城子》：“日出城頭雞子黃。照紅妝。動江光。採蓮江畔，錦纜藕絲長。欲問小姑愁隔浦，長獨處，久無郎。”<sup>30</sup>這兩首詞都具有南朝樂府民歌的明朗清豔的風格。在朱祖謀題清代諸家詞集的《望江南》組詞裡面對於毛奇齡是這樣說的：“爭一字，鵝鴨惱春江。脫手居然新樂府，曲中亦自有齊梁。不忍薄三唐。”<sup>31</sup>朱祖謀為什麼會推崇毛奇齡呢？我們可以結合朱祖謀對於《雲謠集雜曲子》的評論來看這個問題。

在朱祖謀晚年的時候他曾校勘敦煌本的《雲謠集雜曲子》認為：“其為詞樸拙可喜，洵倚聲中椎輪大輅。”<sup>32</sup>這些雜曲子幾乎都是一些表達男女之間思慕之情具有民歌色彩的小詞，但是在朱祖謀看來是不能用情意去評論它們的。如果這樣做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將那些詞與朱祖謀的語境簡單地同構了，也就是說小令是最重性靈與情意的一種詞體，如果因為小令寫作的興起而單單強調性靈的重要，毛奇齡以及《雲謠集雜曲子》也就簡單地因寫作的理由而被單一地強調性靈，他們的作品就顯然喪失了對小令寫作的內在的批評的可能性。而朱祖謀現在強調那些詞“樸拙可

<sup>29</sup> 《同聲月刊》，第1卷，第9號。

<sup>30</sup> 《彊村叢書·彊村遺書》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sup>31</sup> 白敦仁《彊村語業箋注》，巴蜀書社2002年版，第333頁。

<sup>32</sup> 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29頁。

喜”，體會到其背後的情味深厚以及用意的樸拙而不單單見其表面的情意。毛奇齡特立獨行地追摹齊梁新樂府的寫作也應該從這個方面去體會。不是常州詞派的理論可以不變應萬變而是在一個變動的寫作裡面，常州詞派理論能夠以看似矛盾的評價裡找到其統一的地方，不斷地將類似於自己語境的東西陌生化而最終歸結于張惠言所說的表面上“其文小，其聲哀”而又能有比興寄託的內涵這樣一種相反相成的關係。

#### 四、結語

我們將《詞薈》放回到它的語境中，看到它如何閃動出我們已經陌生的東西，正是那些我們深感陌生的東西，構成了對於我們文學史知識的批評。以這樣的視角來看，對於《詞薈》的閱讀就不再是一種簡單的物件研究。由此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如何在一個社會歷史的語境裡面去處理那些五四運動之後新學術的批評者與新學術之間複雜的關係。如果說整理國故運動的學術觀點正是我們最為熟悉的資源，那麼現在，曾經是他們的反對者、批評者的觀點不可能簡單地被用來去反思我們的知識歷史的論據，我們不可能依據某一方的論述來簡單地“返回歷史的現場”。從他們不同意見以及立場的對峙中，我們自然可以非常容易地描述出來他們的不同之處。然而我們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對於處於歷史之中的行動者來說，他們的表述很有可能被我們簡單化或者說將只呈現于文本中的歷史看得過於透明，而實際上只是成爲我們自己知識立場的共謀同時阻止了我們去瞭解我們與紛繁歷史藤葛之間的異質性。將歷史的另一面重新表述出來，不是爲了將之作爲歷史事件的新文化運動的批評，讓那些被邊緣被壓抑的聲音在當下的歷史語境中反敗爲勝，而是通過將歷史問題化來重新理解那些通過文本所表述、所呈現的歷史本身。

### 參考文獻

- 1, 胡適《胡適日記全集》，臺灣聯經出版公司 2005 年版
- 2, 胡適《胡適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版
- 3, 《彊村叢書·彊村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 4, 白敦仁《彊村語業箋注》，巴蜀書社 2002 年版
- 5, 屈興國《蕙風詞話輯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 6, 嚴迪昌《近現代詞紀事會評》，黃山書社 1995 年版
- 7,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
- 8, 譚獻《複堂日記》，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 9, 王鵬運、朱祖謀等《庚子秋詞》，臺灣學生書局 1972 年版
- 10, 譚獻《清詞一千首》（《篋中詞》），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7 年版
- 11, 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 12, 龍榆生《中國韻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 13, 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第三冊，中華書局 2005 年版
- 14, 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4 年版
- 15, 黃蘇、周濟等《清人選評詞集三種》，尹志騰校點，齊魯書社 1988 年版
- 16, 龍榆生《唐宋名家詞選》，臺灣裡仁書局 2007 年版
- 17, 吳梅《吳梅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